

# 从《百鸽图》到《移舟霁壑图》

## ——向往和平与美好的历史见证

□凌承纬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抗战时期，中国美术家向盟国、盟军领导人赠送绘画作品，以此争取他们和盟国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和同情。其中，以张书旂赠送《百鸽图》一事，最具代表性和社会影响。

1940年11月，中央大学教授张书旂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巨幅中国画《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鸽图》)。

张书旂在1941年就去了美国，1957年病故他乡。时间流逝，他和《百鸽图》的历史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2008年起，在进行中国抗战美术史的研究过程中，我和团队在尘封已久的历史故纸堆中发现，1940年末至1941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大后方的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有不少关于张书旂创作《百鸽图》赠送给罗斯福，祝贺他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并以此表达中国人民期盼世界和平愿望的新闻报道和记叙文章。

2010年，北京大学教授丁宁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偶然认识了张书旂先生的儿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少书。

经丁宁介绍，我与张少书建立了联系。其后一年多时间，我在与张少书之间数十封电子邮件的交往中，对张书旂的历史和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我产生了把张书旂包括《百鸽图》在内的艺术作品引进回国展出的想法。我想让这位曾经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后来又远渡重洋，在北美各地克服种种困难不遗余力宣传、介绍、传授中国绘画艺术，努力促进中国人民与北美人民之间的交往，而今却被淡忘的艺术家重新回到国人的视野中。

丁宁还对我说，张少书曾告诉我，张书旂生前曾多次与家人谈到想回国办展、展览地点首选重庆的意愿。这更坚定了我要把他的艺术引进回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陈航的赞同和支持。

2011年6月，我以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的身份提交了一纸建言：《关于举办张书旂中国画及艺术传承作品展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

建言经文史馆上报市政府，不久便获批准、采纳。

这一年岁末，我与活动主办单位的同仁先后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罗斯福图书博物馆和斯坦福大学等地，致力活动的筹备工作。

在位于纽约市郊海德公园内的罗斯福图书博物馆里，管理人员向我们展示了70年前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时悬挂于白宫墙上、至今完好如初的《百鸽图》原件。

画家精湛的技艺和荡漾于画间的温馨和平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经过紧凑而有序的筹备，2012年4月28日，《张书旂中国画及艺术传承作品展览》在重庆隆重举行。

美国及中国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所藏的112件张书旂国画作品，以及其传人的100件作品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公众见面。历经岁月洗礼，《百鸽图》也第一次远渡太平洋回到它的故乡。

当年，重庆日报以《71年后“百鸽”万里飞回山城老家》的通栏标题和整版篇幅文字详细介绍了《百鸽图》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曾经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

张书旂生前想回国举办展览、展览地首选重庆的遗愿得以实现，让年过六旬的张少书倍感欣慰。

抗战期间，张书旂除了向罗斯福赠送《百鸽图》一画以外，还曾向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赠送了他的中国画作品。

送给丘吉尔的《云霄一羽》是1941年张书旂赴美途中滞留香港期间创作的，该画还由被称为“江东才子”的杨云史配诗。

1941年11月9日《香港星期天信报》载文《一份赠予丘吉尔先生的中国礼物》，同时刊登了这幅画作的图片和配诗。

《云霄一羽》现存丘吉尔故居英国查特韦尔庄园。

在研究张书旂赠送画作的过程中，我想到



一个问题：抗战期间是否还有其他中国艺术家把作品赠送给盟国、盟军的领导人？这是否应该作为中国抗战美术史研究中一个继续关注研究的课题内容？

我以为这种馈赠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之举，更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在国难深重之际自觉的历史担当。

果然，不久前，我便有了新的发现！

2024年6月，我抵达伦敦的第一天就来到大英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大厅后，我径直走向了中国馆。中国馆是一个狭长方形的展厅，入口正对面远处的展墙上镶嵌着一幅巨大的壁画《三菩萨图》。

这幅制作于15世纪的大型壁画原在我国河北省行唐县境内的清凉寺中。上世纪20年代被英国人切割成12块运回伦敦，后来又被捐给了大英博物馆，成为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镇馆之宝。

不经意间，《三菩萨图》旁边不远处墙上的

一幅卷轴山水画引起我的注意。清新脱俗的气象，精熟老道的笔墨，似曾相识。

我凑近一看，《移舟霁壑图》，这是一代宗师黄君璧之作！

黄君璧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南京入蜀，应聘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与徐悲鸿、陈之佛、张书旂、许士麒等人同事。

他的山水画功底深厚，尤以描绘云水瀑布见长。其作品构图严谨，笔法苍朴，墨色雅俗共济。

置身《移舟霁壑图》前，让我为之一振的并非是绘画的精到和笔墨所描绘出的恬静安适，而是画面题跋和画旁说明牌上的文字内容。

画作右边跋文为：“移舟便住烟霞室，绿水青山长对吟。壬午年春画于柏溪，黄君璧”。

卷轴画旁边说明牌上内容中文意思是：《移舟霁壑图》黄君璧(1898—1991)作。这幅优美的山水画创作于1937—1945期间。画中的题

跋隐约揭示了这个时期的动荡。

黄君璧于1942年春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位于现两江新区康美街道柏溪社区)创作了《移舟霁壑图》。1942年圣诞节之际，这幅画作被辗转赠送给了英国将军诺埃尔·欧文(1892—1972)。

我推断，1940年底张书旂向罗斯福赠送《百鸽图》一事在国内外社会影响较大，黄君璧与张书旂同事于中央大学，可能受其启示和影响。

其实，对历史过往的深究和推断并不重要，学人治学使然罢了。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的杰作，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增进友谊的象征；优秀艺术所表现出的，伟大民族对世界和平与世间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百鸽图》和《移舟霁壑图》都见证了这一点。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重庆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图①：《百鸽图》

图②：《移舟霁壑图》

【观潮】

# 走进卢作孚的历史现场

□杨尚鸿

纪录片《卢作孚》以《书生》《船王》《布衣》《园丁》四个篇章，真实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先生的传奇人生和主要成就，彰显了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理念。

该纪录片在内容和形式上皆具创新性，堪称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佳作。

首先，《卢作孚》的创作扎根于历史人物研究的丰硕成果之上，导演徐蓓带领团队把纪录片创作本身变成了一种研究式的重返历史现场，建构起历史人物讲述和当下经历者、研究者讲述相连接的共生叙事。

这不但对卢作孚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启蒙与救亡双重奏”的历史回望，也注入了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现实关怀。

该纪录片以卢作孚一生三个阶段的身份主题构成篇章结构，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书生的成长：追随先辈、教育报国，以建设民生公司实现实业救国，在抗战的工业西迁中创造“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奇迹，以产教融合方式在大后方发起乡村建设实践。

这些事迹形成跌宕起伏、极富张力的叙事节奏，但在叙事线上却不拘于完全的线性时序，而是采用螺旋式递进，并首尾照应。

在视听艺术层面，徐蓓继续了她在《大后方》《西南联大》《九零后》等历史文献纪录片中“解放表现力”的做法，创造出由多重声音和多元画面交叠在一起的活态档案，它们似乎从历史封尘中被激活，形成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影像。

影片的多重声音结构设计巧妙而流畅：第一种话语声是纪录片的作者叙述，即由电影演员陈瑾配音的解说词；第二种话语声是纪录片中主要人物的讲述，即摘自《卢作孚自述》的配音。

解说词信息饱满却又精练、节制，配音风格客观平实却蕴涵着温暖，人物自述不但呈现珍贵的历史细节，且无不彰显卢作孚本人超前的思想意识和实践家的智慧，给今人以极大的启迪和感动。

这两个声轨交替进行、贯穿全片，构成主要叙事弧线。不仅如此，这种多重的声音结构设计，还体现在不时穿插的卢作孚研究者、见证者的追溯、回忆、介绍和评论的

同期声。

此外，该纪录片基本弃用了戏剧性的搬演手法，而是着力营造一种新颖的声场和声景，大量使用各种音效空镜，如酣畅淋漓的川江号子、方言顺口溜、模拟环境声，某些能起到叙事作用的音响化的配乐，再加上抒情性的音乐和片尾插曲配置，使观众在沉浸式的观影中审美情感得到升华。

相应的，纪录片《卢作孚》还打破了单一影像的常规，采用了丰富多样的画面影像造型：影片多处插入用于再现叙事的动画或说明性的象征性影像，激活了史实的多元表达，既参与建构了历史的真实，也适应当今网络传播的视听风格，可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走近传记人物卢作孚，走进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道路上奋斗的一代民族精英的历史现场。

例如，第四集中，在提及卢作孚曾于公司刊物上发表“公司的灵魂”一文时，就把原期刊封面照片叠化为具有“稚拙派”画风的水彩动画。

这些风格化、碎片化的动漫美术影像与戏剧性的摄影造型影像，激活了史实的多元表达，既参与建构了历史的真实，也适应当今网络传播的视听风格，可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走近传记人物卢作孚，走进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道路上奋斗的一代民族精英的历史现场。

# 为汉字立一座丰碑

□冯俊龙

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早已落下帷幕，一篇刊载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七期的长篇散文《八千年的凝视》，又掀起了一场关于汉字永不落幕的“文学特展”。

该文作者姜明通过细细描摹这场盛会，如数家珍般解读了汉字何时生成，汉字构造有哪些神奇故事，如何从汉字中寻觅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汉字流变的追本溯源，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精神内涵的酣畅书写。

汉字赋予中华文明的盛大荣光，从作者与特展上那片褐黄色的贾湖龟甲“安静地对视”，逐渐散发。

作者以一位作家的想象、书法家的眼光，兼具文史学者的哲学思考与严密逻辑，满怀激情地论证中华文明有实物可载、生生不息延续的历史，距今至少持续了8000年。

世界文明史8000年来从未中断，是何等令人震撼！这些有生命的汉字，是保存至今、使用至今，并且将一直延续下去，“永远无限地使用”的中华瑰宝，其本身就是一部极其壮观的辉煌历史。

作者写道，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源远流

长，不止于厅堂之内、高阁之上、文物之中，还在社会大众之中、普天之下、人人之间。

文章开篇，等待进入博物馆时，作者与坐在轮椅上从广元青川来的残疾人相遇，即是普通中国人饱受汉字荣光沐浴的例证之一。

善于旁征博引，巧妙勾连，将深邃的思想融入妙趣横生的文字之中，是姜明散文的独到之处。

《八千年的凝视》是一场追本溯源的汉字探秘，引经据典挖掘汉字的出生、成长、成熟。特展中相关文物别具一格的解读，汉字不只是汉字，文物也不只是文物，而是代表意义深远的中国文化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代表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浩瀚历史。

姜明散文的风格，还在善于观察，把观察结果用形象贴切的语言表达出来。

比如“字，就是屋檐下的孩子”，把字比喻成婴孩，于是字就有了生命，就会成长，也就有了思想。

“我突然有些明白大家排队踊跃看展的意义……就如同返乡回家”，用离乡的孩子回家比喻人们踊跃观展，将两者如一的心情无限等同，如此赋予汉字以情感，汉字的生命也就可以永恒。

“汉字是工具、是艺术、是精神，说白了汉字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目

之所遇、耳之所闻、身之所趋、心之所往，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深刻感知“汉字是所有中国人的盐”“汉字还是所有中国人的眼”。

姜明散文的文字美感，不仅在于语言凝练，也不只在于富有韵律，更在于他给予文字思想，让文字动起来，让读者感受到文字的呼吸，感受到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

《八千年的凝视》中，关于青铜鼎、龟甲符号，还有李斯篆的描写，无一不具神韵，无一不使读者心潮澎湃。

特别要强调的是，本篇散文中“凝视”，应该算是作者对中华文化的独特思考。

一只8000年的“眼睛”，既是对8000年来中华文明的回顾，也是对数千年后中华文明的展望。

这种以文学方式书写的历史，并非全是虚构，而是作者在非虚构上进行了一定的虚构。这样的虚构可以看成是对缺失历史的巧妙弥补，或者是对重现历史的合理想象。

作者用他丰富的文史知识、专业的书法技巧、敏锐的新闻广角，以及作家的幽默风趣、诗人的热情豪放、艺术家的专注和浪漫，给汉字树立了一座巍峨高耸的丰碑，让汉字蕴藏的中华民族精神内蕴永远绽放光彩。

# 昨天的打鱼工，今天的护渔人

□马卫

我是在今年仲夏的一天来到大周镇的。虽然之前联系好了，但真正走到董成林家见到他时，还是大吃一惊——因为我心中的渔民形象，是一身沧桑、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刚毅坚强的老男人。

而董成林竟是位30多岁的青年。“你——”我惊讶的嘴，差点合不上唇。

董成林请我入座，上茶：“马老师，我过去真是打鱼人，我打鱼的时间，足足有20多年。不信，你问我妈！”

董成林的母亲端上果盘后，静静地坐在一旁，轻声说：“他以前当渔民，现在是护渔队的队员。我这个儿子，从不让我操心。”

护渔队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属万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管理，由他们引导广大渔民参与长江渔业资源保护，属志愿者性质，国家给予补助。

护渔队员24小时蹲守长江，守护长江万州段80余公里水域。在武陵、大周、陈家坝等地都设有护渔队。其中有17名中青年是由渔民华丽转身，由打鱼人变成护渔人。

董成林生于1985年，今年39岁。他的家就在大周镇外，离镇有几里路远，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种地为生。他的父亲曾是季节性渔民。

最初他家没有渔船，父亲帮人打鱼，上世纪80年代帮工两三块钱一天，不管饭。

渔船规格固定，一般是8.8米长、1.8米宽。也有三板板的小木船，只有五六米长，二尺多宽，仅能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那时的川江风高浪急滩多，打鱼一般是在晚上进行，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而且，因为川江水急礁密，抛网打不了鱼，只能用拖网，用挂钩，或地笼，这样就得两个人，一人划船，一人布网。如果网大，还要用两只船来拖。

大周这地方，有个好槽口，鱼多，本地人叫“打河槽”。

打鱼极讲运气。同样的地方，只是时间不同，有的人一网能打几十斤；有的人一网只能打几条，自家吃都不够；还有的一网起来，连虾子都没有一条，气得吐血。

但是打鱼的时间是固定的，每条渔船到了点必须离开，然后再排轮次，谁也不能例外。有的人等得睡着了，结果那晚就没有收获。

凭着父亲季节性地帮工打鱼，董成林全家吃得饱，穿得暖衣，还修了红砖房子，但离富裕还差得老远。

1985年，董成林生下来，两岁能走路时，就上了船。大人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他就巴巴地看大人打鱼。

当然这时候他不是渔民，只能叫渔娃。我听得心惊肉跳，因为那时还没有修三峡工程，川江的水，像魔鬼一样诡异狡猾，每年都要吞噬不少人的性命。把孩子这么带，不危险吗？

董成林给我的回答是：家家都这么带，有啥危险？有些渔家，除了买东西，都是在船上、水上生活，连孩子都是在船上生的，在船上长大的。长江边的孩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水性。

“你几岁开始打鱼？”我问董成林。“10岁还是11岁？记不太清楚了。那时我读小学高年级，家里已经买了一条渔船，父亲需

要帮手，就带着我打鱼了。”

15岁，董成林初中毕业，没有考上中专、高中，就接过父亲的班，成了少年渔夫。

接父亲的班打鱼为生，也是不得已的事。他17岁那年，父亲病逝。为给父亲治病，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全花光了，还欠下了上万元的债。

“啥病？”“肝癌。”我只能一声叹息。

渔民长期在水上生活，在水上劳动，风里来雾里去，湿气重，所以都喜欢喝烧酒，喝廉价的本地小厂出产的苞谷酒。烈性，燥辣。

“你父亲天天喝酒？”“是顿顿喝酒，一天至少一斤。”

“你父亲不晓得酒喝多了伤肝？”“晓得的。可是，不喝酒，晚上在长江上打鱼，还真扛不住风寒。”

父亲给他留下的，是一条木头船和一身债务。17岁，应是读书的小小年纪，他却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

2000年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野生的长江鱼，更是喜欢。渔民打了鱼不用上岸，早有鱼贩子等着，用带水箱的车子拖到城里。

还了债，他在镇边买地修了楼房。成家，生子，顺其自然。妻子是巫溪人，非常质朴，吃得苦。

可是好景不长。2008年之后，鱼渐渐少了。本地专业的、业余的渔船却一天比一天多。对禁渔，他有他的看法。

禁渔该不该？该。特别是有地方，电鱼和炸鱼，破坏性极大。

2021年1月起，长江十年禁渔。所有登记在册的渔船国家都给予补偿，渔民国家都进行了安置。

年纪大的退休，半老的安排进了清漂队，还有的上了陆地，成了环卫工人。才30多岁的董成林，因为年轻，成为护渔队的志愿者。

“你现在工作咋样？”“现在人们的意识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更重视了，电鱼、炸鱼的少了，但还是没有绝迹。这两种人，只要拿到证据，我们就把他们交到执法部门，都会受到重罚。至于用钓鱼竿钓的，我们一般是教育一番，劝导一番。”

我听明白了董成林的话外音，他对长江，还是念念不忘，有种深深的眷恋。

董成林进了护渔队后，还搞起了自己的产业——在巫溪岳母家山上养跑山鸡，一年能挣上10万。

护渔队轮休的时候，他就往山上跑，巫溪又通了高速，能两边兼顾。

仲夏的江边，橘子正开着花，清香馥郁。长江的水面，货船络绎不绝，一片繁荣。

有护渔标识的船，在长江上巡逻，守卫着这片水域。

如果哪一天，不需要护渔船，不需要护渔队，让董成林们“失业”，长江，会更美丽，更加美丽。